

元杂剧平阳戏剧圈研究



Yuanzaju
Pingyang Xiyuan Yanjiu

姚玉光 赵继红 高建旺 著



元杂剧平阳戏剧圈研究



Yuanzaju
Pingyang Xijiquan Yanjiu

姚玉光 赵继红 高建旺 著



■ 此书为国家科学基金项目 07BZW038 成果
■ 该项目得到山西师范大学的大力资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杂剧平阳戏剧圈研究 / 姚玉光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808 - 5

I. ①元… II. ①姚… III. ①元曲 - 研究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4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3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平阳戏剧圈”的综合考察与研究【07BZW038】的最终成果，面世之际，虽然极端忐忑，也得赧颜絮叨几句，聊遣羞惭情怀。

这一篇羞怯的序言，不是对拙作的概括介绍，也不是对艰辛的自我表白，只是与读者的一种交流。

初涉研究的过程中，流动激荡的思想，免不了在某个地方沉静如潭，把一个个不成熟的律动凝结为瞬间的闪烁。工作即将结束时，捡拾这些曾经遗落的闪烁，便成为交流的冲动。虽然明知自己才疏学浅，但是一贯崇信读者的真诚和宽容，于是也就由着性子口无遮拦了。

“平阳戏剧圈”是元杂剧的四大戏剧圈之一。遗憾的是此前还没有人针对一个戏剧圈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只对本课题的部分子题有过一些涉猎，或者在宏观研究时有过原则性的论列。我们很想抓住这次国家社科项目获批的机遇，全方位地考察研究“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形成动因、创作和演出特色、戏剧文物遗存、地位及影响，弄清从宋金杂剧到元杂剧的嬗变过程，揭开“平阳戏剧圈”的庐山真面目，力求对“平阳戏剧圈”进行系统的描述、分析和理论概括。深感内疚的是，我们的工作极其有限，不敢奢谈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也不敢妄论纠正戏剧史个别传统观点的偏颇，更不敢诳云为山西文化建设从古代戏剧方面提供支撑，只是斗胆把这些不成熟的想法与尊贵的读者坦诚交流。

我们探索性地划出了“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探寻了“平阳戏剧圈”的厚重历史，对其作家和时间跨度进行了厘定；从平阳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对石君宝，郑光祖，李行道、孔文卿、狄君厚、于伯渊、赵公辅进行了考述；从题材追求，思想倾向，艺术个性，地位影响四方面进行了难称详尽的剖析；从儒学地位、宗教格局、土风民俗、印刷出版等方面清理了它们与“平阳戏

剧圈”的联系；从诸宫调和散曲方面考察了它们对“平阳戏剧圈”的描述和记载；对“平阳戏剧圈”的地下、地上戏剧文物遗存，地方志中的演戏描述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和整理，总结了其价值与意义。我们的体会主要是：

1. 我们探索性地圈出了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并用图示的方式予以表达。

圈出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以为，杂剧在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是基础。行政区划的确定表面上是一种地缘切分，实际上相同的地理范畴内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的制约，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和心理认同。因此，元代“平阳戏剧圈”的版图划分，适宜以文化标准为主，同时考虑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当代的戏剧遗存，以便求得一个客观的划分结果。最不适宜的是当代行政区划的标准，因为元代“平阳戏剧圈”不是一个现实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存在。被圈入的这 50 多个县，具有一致的文化认同，从地理位置上看，大略相当于现今的临汾市、运城市、长治市和晋城市，同时包括现在不在这四个市之内的灵石、辽山、榆社、和顺、石楼五县，另外铜鞮并入了沁水。我们认为这就是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文学史上有“平阳戏剧圈”的概念，但没有人明确这个概念的实际区划，这就使概念变得模糊，易被虚化。圈出了这个戏剧版图，可以让概念凝固起来，这对于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当然，对此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的圈定带有抢先性甚至武断性，也不可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只好恭候拙作面世后读者的评断。

2. 我们探索性地对一个“戏剧圈”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理论概括。

专门针对一个戏剧圈进行系统研究，学者们还没有来得及下手，让我们捡了一个便宜。我们只能试探性地先圈定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接着对“平阳戏剧圈”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三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学视角的分析，然后从儒学地位、宗教格局、土风民俗、印刷出版方面进行文化学角度的考察，并从诸宫调和散曲两个方面进行文艺学方面的审视，重点对“平阳戏剧圈”的七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整体的剖析研究，从作家考述、题材追求、思想倾向、艺术特征、地位影响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的剖析，最后对“平阳戏剧圈”的戏剧文物遗存进行田野调查，按不同朝代和露台、戏台、碑刻、壁画、砖雕等不同种类进行清理研究。这种研究一个“戏剧圈”的学术框架，是否合理，是否科学，虽然也邀请部分专家学者进行过论证，但内心还是忐忑不安，唯恐有挂一漏万之嫌。

3. 我们试探着梳理出了宋金元杂剧破茧成蝶的过程。

宋金杂剧是如何演变为元杂剧的，戏剧史上没有准确的描述，许多人对元代初年杂剧突然崛起感到茫然，学术界曾经专门开会进行过专题研讨，至今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平阳戏剧圈”的戏剧文物足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物链，它显示出中国古代戏剧由形成到繁荣的演进过程，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角色地位的此消彼长，显示出由比较固定的戏谑调弄为主的杂剧到“五花爨弄”再到故事体的元杂剧的破茧成蝶的过程。

“平阳戏剧圈”的金代戏剧文物，“五花爨弄”比重最大，说明这是金代杂剧常见的表演形态。同时金代杂剧演出正在向叙事化、故事化的方向跨越，引戏被逐渐边缘化并最终退出了行当系列；装孤的作用渐趋增强，由“或添一人”的地位逐渐走向了戏台的核心，甚至出现了“双孤”砖雕；“双副末”现象也已经出现，这说明戏班正在根据剧情设置角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杂剧艺人开始突破了三段式的“五花爨弄”的调笑体制，根据表演的内容增减角色，为杂剧走向成熟的叙事体制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这种变化具有方向性的导引意义，预示了元杂剧的迅速崛起。正是有了金杂剧的探索和铺垫，才会形成元代杂剧的横空出世，称霸曲坛。

“平阳戏剧圈”的戏剧文物表明，在金元之交，北曲杂剧业已形成，但“四折一楔子”的体制是否存在，现存的160余种“元杂剧”剧本，是否一部分可能为金代作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敢妄下结论。人们对于元杂剧为何一经出现便高度成熟、流播全国迷惑不解，如果更多地了解金元间平阳地区戏曲活动的相互传承与联系，或许会疑团顿失。

4. 我们认为民间信仰是杂剧主盟的根本动因。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民间信仰是杂剧主盟的根本动因。民间信仰，古已有之，宋代以后，官方的支持力度空前增大。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岳渎、城隍、仙佛、山神、龙神、水泉、江河之神及诸小祠，皆由祷祈感应而封赐。“平

平阳戏剧圈”本来就寺观林立，在官方的支持下，民间信仰之风，愈煽愈烈，淫祀神庙，无社不有。入元之后，此风有增无减。

“平阳戏剧圈”的戏台清一色都建在民间信仰的神庙之中。土地由信徒捐献或出资购买；建造主体是民众，同时也有官员题篆写记，有的甚至慷慨解囊。在建庙问题上，官与民似乎分歧最小，共鸣最大。可见民俗的力量很难估量。善良的百姓总是乐于从自己辛苦恣睢得到的微薄收成中，切分出一部分来孝敬神灵，修庙塑像，献牲供乐，以此求得生活的富足和家人的平安。

戏剧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艺形态，最容易得到民众的青睐，以献戏表达虔诚，借神灵愉悦自身，舒展一下孔武的肌肉，缓解一下压抑的内心。民众既是戏剧的助产婆，又是戏剧的消费者，既是戏台的构建者，又是戏台的拥有者，在推动戏剧走向辉煌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喜爱杂剧，需要杂剧，追捧杂剧，建台演戏，掏钱看戏，使杂剧的创作—演出—消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构成了一种良性的气场，使戏剧获得了挺进占有农村市场的强大推力。

5¹ 我们对杂剧的基本特征进行了个性化的初步概括。

戏剧的基本特征学术界争论较大，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中国戏剧到底是抒情性的，还是叙事性的，学者们依然互不相让。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杂剧主盟问题上，外部环境无论多么适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盟主本身的优势，这就是杂剧的综合性、定时性、叙事性、通俗性和普适性。

综合性：杂剧一目了然的裸露表层的优势自然是综合性。这一点人尽皆知。正因为杂剧能够给接受者更丰富更高级的审美享受，必然成为文艺的新宠。当杂剧吸收诸宫调等民间文艺形式之后，它的体制便发生了本质意义的提升。这种一个角色主唱的“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模式，全面超越了同侪，确立了其他文学艺术无法抗衡的盟主优势。

定时性：定时性在主盟中的优势常常被人们忽略。定时性是指一本元杂剧演出的用时大致为一个时辰。其优势是：一适得其中，它使杂剧获得了独当一面的地位，无须它艺协助，无须自我拼凑，一本杂剧完全可以独立支应。二心中有数，编剧写戏，戏班演戏，百姓订戏都心中有数。作为商业行为，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约定，避免了许多模糊和误会，各方都在规范中行事。三同步协调，符合一般人的审美习惯，不至于审美疲劳；

四符合社会生活的节奏，适合农耕文明条件下劳作、休息与娱乐的时间切分，用于娱乐、节庆、庙会、春报、秋赛，恰如其分。

叙事性：无论旦本还是末本，每一部杂剧都在演述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无法否定事实。要让人们专心致志地乐一个时辰，从策略层面看，除了叙事恐怕别无选择，否则只能增大演出的成本。杂剧是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语言来叙事的。它包括文本的创作和舞台的再创作。宾白以叙事为主，叙中含情寓理；唱词着重叙述人物行为的内心想法和情感褒贬；科是作者以提示的方式对叙事进行的限制和规定。舞台的再创作是对文本叙事的搬演，并调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事件进行个性化“呈现”；用角色行当在戏台上“呈现”故事，是杂剧的大智慧，因为它只大略划分了戏剧矛盾的基本构成，并没有定死人物的具体性格；就是题目、正名也是对整本杂剧叙事的概括。

普适性：杂剧在形成之初就具有浓重的草根文化特性，即使文人参与进来，也无法改变，只能顺势前行。首先，文人多是下层书会才人，下层官员，本身就具有草根原色。其次，杂剧必须经过舞台的二度创作，在特定的剧场中才能成为可接受的文艺消费产品。参与二度创作的人员是排斥文言的：接受者的主体是基本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民和市民；演员说唱白话轻车熟路，说唱文言则勉为其难；统治阶层主流的蒙古贵族听白话还凑合，听文言则如天书。杂剧要生存，要发展，只能走通俗化的道路，这是杂剧的必然选择，也是文人的必然选择。

同时，元杂剧的服务对象是全方位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无论官府还是百姓，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个都不能少。600余部元杂剧，除了绝对不可触及的政治禁区和道德底线，无所不包，从思想角度判定部分作品并非关汉卿所作，恐怕是靠不住的。以为浪子斗士不可能创作喜庆歌德的作品，恐怕有点偏颇。

6. 我们认为杂剧传播的路线图并非单纯的由城市到农村。

我们认为过去戏剧由京师向外埠、由城市向农村传播的固有看法，与“平阳戏剧圈”的实际情况多有抵牾，认为城市与农村是互相影响的。首先，三通宋代石碑有关戏台建造的记载，证明早在北宋，当孟元老们津津乐道京师勾栏瓦肆之际，“平阳戏剧圈”已经出现了比较先进的叫做舞楼、舞厅、舞庭、舞亭的戏台，而戏台的出现是戏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最早的戏台的建设者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能工巨匠，而是社里乡间的

普通百姓李廷训、任真、秦一之辈。可见在戏剧形成之初，就浸染着农耕文明的元素，依托着乡镇农村的天地，接受着农民热衷的推崇和忠实的拥戴。城市勾栏瓦肆的戏剧演出无可置疑，但舍弃农村绝不是完整的戏剧发展史，而且农村的戏剧形态可能比城市还要先进。其次，“平阳戏剧圈”的金代戏台，为我们提供了无声而形象的实物资料，呼唤着当代学者借此去复原历史的真相。其三，“平阳戏剧圈”元代戏台的地理分布相当均衡，说明它的内部结构是紧密的，整体规模是宏大的，这样的气场是杂剧主盟的强大推力，这是元杂剧占领广大农村文艺消费市场的有力见证。

“平阳戏剧圈”宋金元戏剧文物的链条式存在，不是否定同一时期城市杂剧的演出，却可以无可置疑地证明农村杂剧的繁荣。而这一时期文献对城市杂剧演出的场所、时间、体制、内容等方面的描述，并不能证明农村的杂剧来自城市。

7. 我们认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呈现为共时性和不平衡性的扭结。

“平阳戏剧圈”的戏剧文物表明，中国戏剧的发展呈现为共时性和不平衡性的扭结；不平衡性体现为南方与北方戏剧发展的不平衡，四大戏剧圈与圈外戏剧发展的不平衡，“平阳戏剧圈”内部戏剧发展的不平衡。共时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宋元时期的南方与北方，南宋与金，就一个朝代而言，戏剧的发展是共时性的；第二，“平阳戏剧圈”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四大戏剧圈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第三，在“平阳戏剧圈”内部，平阳地区、河中地区、潞泽地区大体上是共时性的。不平衡性与共时性是孪生兄弟。一种艺术不可能一夜之间在全国普及，特别是在传播方式和传播能力还处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时代更没有这种可能，而是首先在部分区域形成，发展，受到追捧，然后才向其他地区传播。

8. 我们认为中国戏剧的“行当”不应该被视为程式化。

“行当”在传统的观念中被看成戏剧程式化的体现。我们认为“行当”只是中国戏剧人物类别的大体划分，是剧作家和艺人智慧的集中体现，它不是一种性格的规定，同一个“行当”中，人物性格可能有很大不同，包容性很大；古人熟练地划分“行当”之时，并没有“性格”的具体理论表述。既然性格无论，又何谈“行当”就是性格呢？

“行当”也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重要标志。先秦的泛戏剧形态无论如何丰富，也说不上“行当”的划分，《东海黄公》是“行当”的可喜萌芽，唐代参军戏的参军和苍鹅使“行当”脱颖而出，并对后世产生了直接

而重大的影响，这就是副末和副净。我们之所以把宋金看成中国古代戏剧的形成期，与其五至七个“行当”的形成因果相依。原有的“行当”无法容纳元杂剧急剧膨胀的叙事需要了，就不得不破茧化蝶，衍生出系列化的角色行当，戏剧的繁荣时代也就指日可待了。

9. 我们认为宋金与元代的角色有联系也有本质区别。

元杂剧的角色体系，既有宋金杂剧角色的历史沉淀，又有元杂剧本身的创新发展。其角色的设置主要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安排的，只不过安排的过程中，运用了宋金杂剧角色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张和改造。这是元杂剧不同于宋金杂剧的本质体现，是元杂剧与宋金杂剧在角色设置方面的本质区别，也是元杂剧冲破“五花爨弄”的固定体式，跨入广阔而自由的天地根本要素。

发现总是有限的，研究也只能是有限的；发现总是不断的，研究也就是无限的。有限的认识被推翻似乎是必然的，我们等待着推翻，因为这种推翻大多是学术的进步。既是口无遮拦，失误自然难免，唐突之处，期待方家的批评教正。

姚玉光

2011年12月于山西师大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戏剧版图	(1)
一 “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	(1)
二 “平阳戏剧圈”的厚重历史	(3)
三 “平阳戏剧圈”的作家厘定和时间跨度	(14)
第二章 社会学考察与研究	(16)
一 平阳政治与“戏剧圈”的关系	(17)
二 平阳经济与“戏剧圈”的关系	(26)
三 平阳民族关系与“戏剧圈”的关系	(32)
第三章 作家考察与研究	(36)
一 石君宝	(36)
二 郑光祖	(39)
三 李行道、孔文卿、狄君厚、于伯渊、赵公辅	(40)
第四章 创作考察与研究	(43)
一 创作题材的追求	(43)
二 创作的思想倾向	(57)
三 创作的艺术特征	(79)
四 创作的地位影响	(113)
第五章 文化考察与研究	(129)
一 儒学地位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	(129)

二	宗教格局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	(161)
三	民间风俗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	(190)
四	印刷出版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	(203)
第六章	文艺考察与研究·····	(217)
一	诸宫调对“平阳戏剧圈”的影响·····	(217)
二	元代散曲与“平阳戏剧圈”的关系·····	(232)
第七章	戏剧文物考察与方志描述·····	(249)
一	“平阳戏剧圈”的地下戏剧文物遗存·····	(249)
二	“平阳戏剧圈”的地上戏剧文物遗存·····	(288)
三	“平阳戏剧圈”地方志中的演戏描述·····	(348)
四	“平阳戏剧圈”文物遗存的价值和意义·····	(368)
主要参考书目·····		(398)
后记·····		(404)

第一章 戏剧版图

一 “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

要想划出元代“平阳戏剧圈”的版图，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划分的标准。是现行行政区划的标准呢？还是历史行政区划的标准？是文化类型的标准呢？还是戏剧遗存的标准？或者是别的什么标准呢？

在我看来，杂剧在元代是所有文艺样式中综合性最高的艺术形态，它融合了文学、语言、宗教、历史、音乐、舞蹈、杂耍、武术、服饰、化妆、建筑等多种元素，也利用了政治、民族、文化、娱乐、民俗等社会条件，使自己得以流行并传播。杂剧在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是基础。行政区划表面上是一种地缘切分，实际上相同的地理范畴内的人们，受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的制约，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和心理认同，语言的一致性或近似性也要明显得多。因此，元代“平阳戏剧圈”的版图划分，适宜于以文化标准为主，同时考虑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当代的戏剧遗存，以便求得一个客观的划分结果。最不适宜的是当代的行政区划的标准，因为元代“平阳戏剧圈”不是一个现实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元代的临汾（平阳）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晋宁路。《元史》云：

晋宁路，唐晋州，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大德九年以地震改晋宁路。户一十二万六百二十，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领司一，县六，府一，州九；府领六县，州领四十县。

录事司，县六。临汾、襄陵、洪洞、浮山、汾西、岳阳。

府一，河中府。唐蒲州，又改河中府，又改河东郡，又仍为河中府，宋为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元宪宗在潜置河解万户府，领河解

二州。河中府领录事司及河东、临晋、虞乡、猗氏、万泉、河津、荣河七县……八年割解州直隶平阳路……

州九：绛州，唐初为绛郡……元初为绛州，行元帅府，河解二州诸县皆隶焉，后罢，元帅府仍为绛州，隶平阳路。领七县：正平、太平、曲沃、翼城、稷山、绛县、垣曲。

潞州：唐初为潞州，后改上党郡……元初为隆德府，行都元帅府事。太宗三年复为潞州，隶平阳路。至元三年以涉县割入真定府，以录事司并入上党县，领七县……上党、壶关、长子、潞城、屯留、襄垣、黎城。

泽州：唐初为泽州……领五县：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陵川。

解州：……领六县：解县、安邑、闻喜、夏县、平陆、芮城。

霍州：唐初为霍山郡……领三县：霍邑、赵城、灵石。

隰州：唐初为隰州……领五县：隰川、大宁、石楼、永和、蒲县。

沁州：唐初为沁州……领三县：铜鞮、沁源、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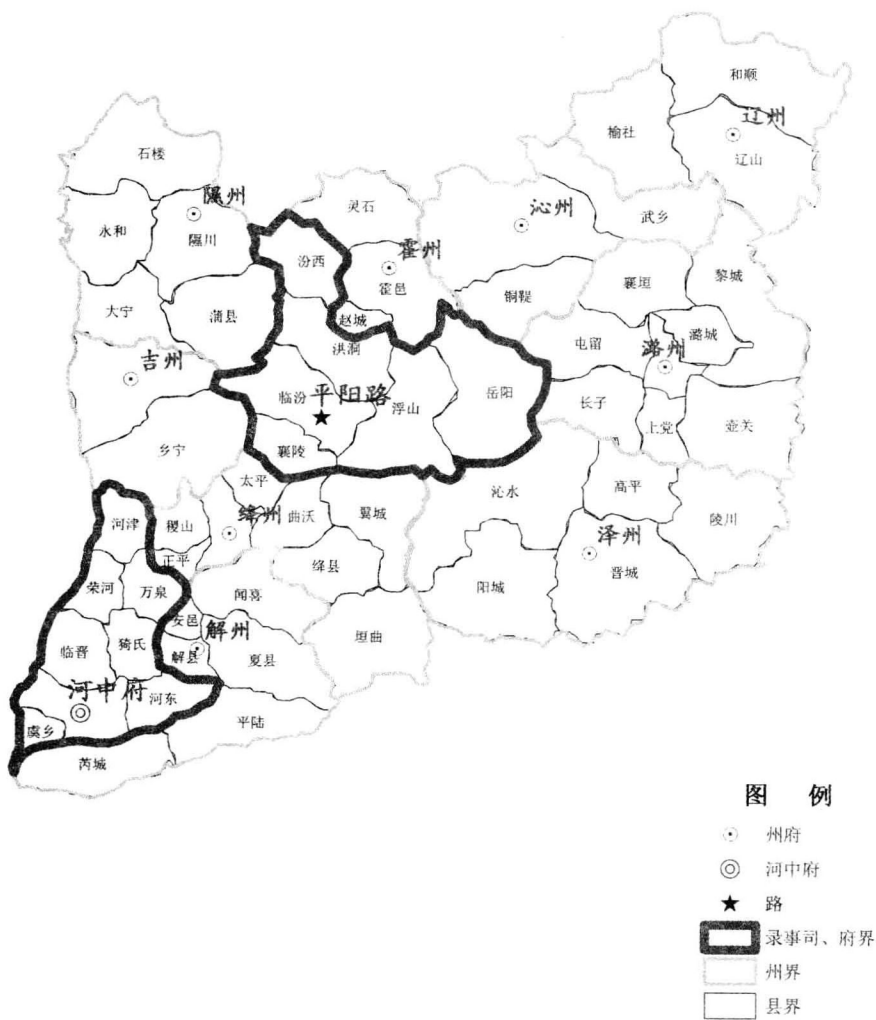
辽州：唐初置辽州……领三县：辽山、榆社、和顺。

吉州：唐初置西汾州……领一县：乡宁。^①

从以上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元代的晋宁路，治所在平阳，也就是今天的临汾。第二，晋宁路的版图，包括录事司直属的六个县，河中府管辖的七个县，分属九个州管辖的四十个县。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府州所辖县的区别，晋宁路共领县五十三个。第三，这五十三个县，具有一致的文化认同，从地理位置上看，大略相当于现今的临汾市、运城市、长治市和晋城市，同时包括现在不在这四个市之内的左权、灵石、辽山、榆社、和顺、石楼五县，铜鞮并入了沁水。这也就是元代“平阳戏剧圈”的基本版图。如图：

当然，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平阳路的基本版图，因为受元代“平阳戏剧圈”影响较大的地区，也应该放在

^①（明）宋濂等：《元史》卷58，志第十，地理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25—927页。



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戏剧版图

其版图之内，只不过它的色彩较为淡一些罢了。在后面的论述中，有些问题是会触及这一观点的。

二 “平阳戏剧圈”的厚重历史

元代“平阳戏剧圈”的核心是平阳。

元代的平阳就是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市。

现今的临汾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中游。东倚巍巍太岳山，与长治晋城为邻；西临滚滚黄河水，与陕西隔河相望；北接晋中、吕梁；南通运城。闻名遐迩的临汾大鼓楼的东西南北门额上就分别赫然题写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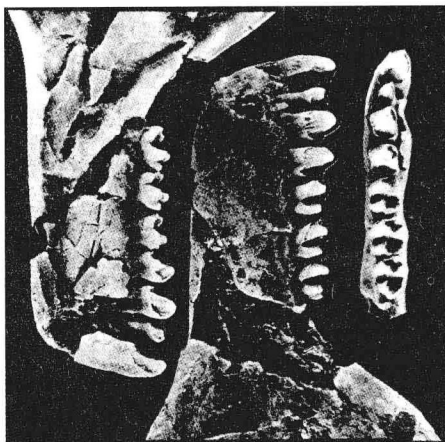
临汾市下辖汾西、吉县、安泽、大宁、浮山、古县、隰县、襄汾、翼城、永和、乡宁、曲沃、洪洞、蒲县 14 个县和一个尧都区。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升格为县级市的侯马和霍州，一直由临汾市代管，历史上、地缘上更是隶属临汾市范畴。现今的临汾市比元代的晋宁路要小得多，大致相当于元代晋宁路的录事司所属六县，以及霍州、隰州、吉州所属十县。

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1950 年与临汾各为专区，1954 年合并为晋南专区，行署所在地是临汾，1970 年又各为专区。在文化上两个市一脉相承。

石楼县也是这样。1950 年属临汾，1971 年划归吕梁地区。为此，讨论元代“平阳戏剧圈”，我们很自然地把运城市 and 石楼县都纳入元代“平阳戏剧圈”的基本版图之内。

当我们怀着考察元代戏剧史的庄严，穿越时间的隧道，面对 700 多年前的平阳重镇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一方热土所承载的无愧于中国、无愧于历史的文化遗存。而这些文化遗存也正是“平阳戏剧圈”形成的文化土壤。

20 世纪 90 年代在“平阳戏剧圈”的垣曲县发现的“曙猿化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类人猿。曙猿化石发现以前，由于人类化石不断出土，人类摇篮说曾摇摆于各大洲。1856 年和 1907 年，分别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物人和海德堡人，使人类摇篮欧洲说风行于世。20 世纪 60 年代，在非洲发现了以埃及法尤姆人为代表的大量的早期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后，非洲说又占了上风。1994 年至 1997 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垣曲县发现了众多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牙齿、颌骨等古生物化石。中国、美国科学家联手对这些化石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证实这些化石生成于 4000 万年前，并把这些化石命名为“世纪曙猿”。两国科学家联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认为“世纪曙猿”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发现最早的、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祖先，约生活在距今 4500 万—4000 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这就使垣曲成为



在垣曲寨里发现的中华曙猿下颌骨

最早的人类发源地。200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以《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为题,对“世纪曙猿”及其研究成果作了报道,指出: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推翻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同时也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正如贾兰坡先生所说:“曙猿是我们的遥远祖先。没有它也就没有后来某种猿类,没有某种猿类,也就没有现在的人。一切生物都是一脉相承的,在进化过程中无一例外。”“曙猿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说它是人类的远祖亦无大错。既然承认‘从猿到人’之说,也得承认曙猿是后来猿的祖先。”“这种早期的猿类的原始祖先——曙猿即在中国发现,推测人类起源于中国,对科学并无多大的妨害。”^①

1961年至1962年,考古学者在“平阳戏剧圈”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考察时,在50余米厚的更新世早期沙砾层中,发掘出了中国长鼻三趾马、山西披毛犀、晋南麋鹿、纳马象等20余种已绝种的古生物化石。化验证明,这些动物遗骨是被火烧过的,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烧骨”。经古地磁法测定,西侯度文化遗址距今至少在183万年以上。因而学术界认为,西侯度人点燃了人类第一把文明圣火,开创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使原始先民逐步具备了全天候的活动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并把此前认定的人类用火时间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时至今日,许多地方还保留着每年

^① 《人民日报》,2000年6月13日,第7版。